

王向峰 著

中国古代美学史论

ZHONG GUO GU DAI MEI XUE SHI LUN

辽宁人民出版社

中国古代美学史论

王向峰 著

©王向峰 2015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古代美学史论/王向峰著.—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15.4

ISBN 978-7-205-08158-4

I.①中… II.①王… III.①美学史—中国—古代
IV.①B83-09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88625号



出版发行:辽宁人民出版社

地址: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编:110003

<http://www.lnpph.com.cn>

印刷:朝阳铁路印务有限公司

幅面尺寸:170mm×240mm

印张:23.75

字数:340千字

出版时间:2015年4月第1版

印刷时间:2015年4月第1次印刷

责任编辑:韩喆

装帧设计:杨勇 高政华

责任校对:徐丽娟

书号:ISBN 978-7-205-08158-4

定价:48.00元

总 序

杨路平

哲学社会科学是人们认识和改造世界、推动社会进步的强大思想武器。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水平已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和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志，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党历来高度重视哲学社会科学，不同历史时期，不同历史阶段，我们党始终把哲学社会科学作为推进革命、建设、改革与发展的重要力量。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高瞻远瞩，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全局的战略高度，谋划部署了哲学社会科学事业，颁布了《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启动实施了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极大地推动了哲学社会科学的繁荣发展。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是当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历史担当。

推动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事业发展，需要加大对社会科学工作的支持力度，需要鼓励潜心研究、扎实做学问的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精神产品生产，需要积极营造哲学社会科学繁荣发展的良好氛围。为实现这一目标，从2012年开始，辽宁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在辽宁人民出版社的大力支持下，每年资助出版具有一定学术价值、应用价值与科学普及价值的图书。这些图书涵盖了经济、政治、社会、教育、管理、美学、历史等多个学科领域，既有研究列宁工人阶级执政党建设问题，又有研究转型期群体性事件；既有教育政策问题，又有涉猎食品安全问题；既有历史学，又有考古学、美学；既有管理学，又有社会学。这些图书体现了辽宁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多年来潜心研究，不断探索的求实精神。这次呈现给大家的这些优秀作品，对于繁荣学术、建设学科、培养人才、服务社会，宣传和推介辽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鼓励社会科学工作者潜心研究辽宁经济社会发展

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鼓励专家学者服务社会，不断提高辽宁哲学社会科学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相信辽宁省社科联资助出版优秀社会科学图书工作，会进一步激发辽宁省社会科学工作者从事理论研究、学术研究、政策研究的热情和积极性，会进一步引导社会科学工作者深入学习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加强辽宁全面振兴的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研究。同时，我们也相信今后会有一大批全面阐释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生态文明建设和党的建设的优秀成果面世，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哲学社会科学做出贡献。

2014年9月

序 一

以圆览之力 收会通之功

王充闾

在全球化的文化语境下，立足于新时代的要求，从现代视角、以宏观视野，按照严谨的学术规范，做好传统美学的价值转化工作，亦即对于古代美学文本进行新的理解、新的思考、新的审视，揭示其基本精神、个性特征、独特蕴含以及现实意义，这确是学术界当前面临的一项迫切而光荣的使命。向峰先生《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这部美学新著的面世，可谓“得其时哉”。

去年以来，我撰写《逍遥游——庄子传记》，接触到了这个课题，深深地体会到，对于古典美学进行现代阐释，这是一项很吃力的事情。当时我所面对的，不过是庄、老以及后世的几位道家学派人物；而向峰先生所作的，却是一部中国美学古代通史，纵跨三千年，旁及上百位思想家，从《周易》一直讲到《红楼梦》。

那么，有些什么工作要做呢？至少是——

由于古典美学植根于古代文化的丰厚而独特的土壤之中，通过历代前贤往哲对于美的本质及其意义的研究、探索，留下了难以胜数的珍贵的美学遗产；所以，首先必须进行“历史还原”工作，亦即《文心雕龙》中所说的，“沿流讨源，虽幽必显”。这就需要深入发掘古典美学资源，全面细致地占有与梳理原始资料，决不能像清人戴震所批评的：“空凭胸臆，凿空而得”。此其一。

其二，以此为依托，通过正确处理真与伪、源与流、因与创、取与舍的关系，融入个人的领悟、体味、理解，认真进行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的识别、鉴别工作。

其三，进行微观考辨，包括个案分析、专题研究、背景研索、体系考察，等等。

其四，在此基础上，“运用脑髓，放出眼光”（鲁迅语），拓开一个浩大的审美天地，做出创造性的阐释，赋予古代美学以崭新的价值关照。

还有一项，同样是必不可少的。正由于置身全球化的学术背景、文化语境，理所当然地必然面对一个如何处理好继承本国美学遗产与借鉴西方美学传统的关系问

题。就此，向峰先生在书中做了十分割切的概括，当然，实际上他也是这样做的。他说：为了实现美学的双向架构，“既要吸收西方美学的异质因素，加以消化，同时又必须扎根于传统文化的土壤之中，才能具有自己的独创性与民族特点。这样的中西比较，既反对全盘西化，又反对抱残守缺”；“中西美学比较，要求研究者对中西文化要有基本的了解、体验，对自己所比较的范围要有系统深入的研究，才能达到一定的深度，作出独到的建树。在这一方面，已故的著名美学家宗白华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典范”。

归根结底，就是要求当代学人必须拥有“圆览”、“会通”的功力。

何谓“圆览”？按照古人的解释，就是广泛的征采、细致的观察，近乎我们通常所说的博学多识。“会通”一词，最早见于《周易·系辞》：“圣人有以见天下之动而观其会通”。会通的涵盖面很广，不仅指古今会通、中西会通，也包括文理会通、思诗会通；其义既可以理解为融会贯通、四通八达，也含有灵活运用、不拘常规的意蕴。就是说，不仅体现于博大精深的学术功力，同时还需具备开放、多维的思维方式。

统观中外古今，一切有重大成就、超绝建树的科学家、艺术家、大学者、政治家，无一不具备这一本领和素质。所以，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之一、明代末年著名思想家徐光启有言：“欲求超胜，必先会通。”他本人就是一个复合型人才，除了国学，对于西学，举凡数学、天文、机械、水利、农学、军事学，都有深湛的研究。

作为全国知名的文学家、美学家、教育家，向峰先生也正是一位通才、通儒。你只要展读他的六百万字的文集，或者直接聆听他讲授的课程，甚至日常的普通接触，一个强烈的感觉，便是其“圆览”之力与“会通”之功。远的不说，去冬，刚刚读过他以五绝形式创作的二百四十首《四季咏怀》组诗，春初，又看到他对《全唐诗》的解读——他是一位既精通诗学又擅长创作的出色诗家；他还是以精深、博雅见长，且多有创见的散文随笔作家和文学评论家；对于马克思的哲学、经济学尤有精湛的研究，独步当今，别具只眼，这有所获的“鲁迅文学奖”堪资作证；而于美学，更是他的看家本领、特出长项，他的《西方美学论稿》、《中国美学论稿》、《中国现代美学论稿》都是我的案头书，再加上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这种多学科、多领域的创造成果，特别是整个美学研究的系统工程，充分反映出作者开阔的学术视野、严谨的治学态度与超拔的学术水平。换句话说，正是以博观圆览之力，收灵明会通之功。

读过《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感到书稿有以下几个特点：1.《中国古代美学史论》

对于元典有广泛深入地发掘，材料非常丰富，形成为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基本轮廓。

2. 《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对于古代美学研究紧紧把握历史线索，突出了主要人物、重点论著、基本观点，而且立章分节，有深入剖切的分析，把许多难懂的、玄妙的理论概念、范畴，以及形象的比喻，都加以释解，成为可以实践应用的理论思想，达到了以史显论、以论带史的史论统一境地。

3. 《中国古代美学史论》的研究对象是历史的存在，但在对历史阐发中却展现了阐释者高超、广阔的现代视野，不仅在许多问题上能与西方美学加以比较联系，更能以马克思主义思想予以是非、完缺的认定。

4. 《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是美学思想史，阐发它的范畴内涵，必须与中国文学艺术史紧密联系在一起。书稿的作者修养对此有极大的适应性，能以大量相应的文学艺术实例，化解理论范畴的坚硬性，使书稿具有明晓畅达的文风和美育意义。

写到这里，我记起了八十年前，鲁迅先生对一位写作者所做的一段评语：“纵观古今，横览欧亚，撷华夏之古言，取英美之新说，探其本原，明其族类，解纷挐领，灿然可观，盖犹识玄冰于瓶水，悟新秋于坠梧。而后治诗学者，庶几由此省探索之劳已。”借此以题向峰先生之力作，我认为还是很确切的。

意犹未尽，以四句小诗足成之：“学殖渊深美在中，会通今古羨王公。诗思涌荡天涯远，大吕黄钟气若虹。”

2013年12月14日

序 二

理论繁华后的朴素与提纲简约中的通贯

杨乃乔

王向峰老师是我的博士导师。20世纪90年代初，我在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攻读文艺学博士学位时，曾得益于王向峰与童庆炳两位导师的指导。这么多年来，每次回忆起读博士的那段求学经历，我对同时有两位导师的培养，总感到那是一种不可多得的幸运。

早年王老师从吉林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即一直在辽宁大学中文系任教。20世纪80年代，博士生导师资格的认定需要通过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的直接评定审批，王向峰老师是经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审核第四批通过的博士生导师，在90年代初，被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聘为文艺学专业的客座教授及博士生导师。

我第一次见到王老师是在童老师的家里，那时，我还是一位青年学者，当然是带着敬重坐在两位老师的身边听他们交谈。也正是从那次两位老师的谈聊中，我开始了解北京师范大学文艺学及全国文艺学的一些前沿信息。如果说，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一个起点是从我的硕士生导师汤炳正先生那里开始的，那么，我的学术生涯的第二个起点，就是从这里接续的。

二十多年过去了，当年王老师的形象与气质始终存留在我的记忆中，从未曾忘却过：他个子不高，衣着朴实，说话沉稳，略带一点东北口音，音色有一些沙哑而显得沧桑。从王老师身上透出的气质与修养中，让我第一眼就感受到他的亲切与从容，还有一种没有距离感的随和。当时我私下思忖，这就是我的导师，一种让人可依赖的父辈感从我心底油然而生。

也正是契合这样一种感觉，我对“老师”这个称呼收获了更为切近的体会，他就是我的老师，如果把他称之为“先生”，这个称呼反而远了。二十多年来，无论是在称呼上，还是在心里，我一直称呼他为“王老师”或“老师”，没有隔了一层地称呼他为“王先生”或“先生”。起初这是一种亲切，后来则是一种亲近，再后

来则更是一种亲情了。

王老师现在虽已高龄，依然勤奋于笔耕，这次他修订出版这部近四十万字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着实是一件让人兴奋且敬重的事。

二十多年来，每逢年三十晚上，我都会给王老师打电话问候，并且在电话中得知，每年除夕王老师与师母都要一起把“春节联欢晚会”看完了再去休息。在春节除夕，亲人与亲人、朋友与朋友之间的拜年电话是一种相互珍重的问候，而对于学生来说，我每年在这个时候给王老师及师母打电话问候，都能够获得一种安慰，因为我了解到两位老人的身体依然健硕。尤其是对于高龄学者来说，这无疑是一种难得的福气。我们都知道，学者的生涯是清贫且清苦的，一位真正的学者在一生的学术生涯打拼中是非常消耗精力与体力的，这种透支性的消耗，较之于体力工作要负重得多。干体力活累不死人，再累，酣睡一觉就恢复了，而学术的用心、操劳及那种貌似儒雅的竞争是可以伤人一生的。所以学术是性命，是一种代价！

我心里总是在惦念着王老师，会时时想起他，然而非常惭愧的是，总是因为工作的繁忙，终于还是疏于对他的问候。每年也就是在除夕给王老师打一个电话，向他问好，当电话那端传来王老师依然略带沙哑的声音：“乃乔，我很好！”这个时候我有一种难言的感情。王老师年事已高了，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代学者工作的劳顿与紧张，我常常疏于向他问候，远在上海工作，在生活上帮不上王老师的忙，心里总是有一种愧疚感。当然，在心中还有一种苦涩，我们这时代的学者被学术及其他各种规则压榨得太多了，最终连时常向老师问候的时间及问好的心情也被占尽了，这是一种怎样的无奈呢？！

我不是给自己找借口，心里细细想想，这个时代的机遇、信息、功利与竞争太过于密集了，并且这个时代的生存者都是非常现实的，现实到让人们无法逃避这个时代的诱惑与紧张，能够拥有一个轻松的心情向自己的老师、朋友与亲人问个好，这恐怕也是一种奢侈了。我特别不愿意看到这将成为一个老师逐渐在学生心里淡去的时代，此刻，我愿意站在学生的身份上给出一个温馨的祝福：天下学生愿天下老师身体安康。

我拿到王老师这部修订后显得更为厚重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时，心里有一种别样的感动：一是敬重于老师对学术的持久性执着，二是感佩于老师身心的健硕。即使对于一位中青年学者来说，撰写与修订这样一部厚重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也不是几年可以造就的。尤其是修订一部专著，业内学者都知道，修订一部专著需要多年的沉淀，更需要保有对这一命题所持之以恒的学术激情。我拜读完这部专著

时所收获的第一感觉，那就是王老师的学术心理是年轻的。

前几日，王老师打电话与发电邮过来，请我为他的这部专著写一个序，坦率地讲，我心里颇有些意外。学生给老师的专著撰序，这不是我的辈分及学识可以允许的。多年来，我在学界的行走及所遇让自己养成了自知之明。我与王老师之间有着深厚的师生之情，从不假于礼节般的客气，我推托后他依然坚持，其实我知道，这是源于老师对学生的关爱与提携。

王老师是一位学养厚重的文艺理论家，他的学术思想与学术活动曾在20世纪的70、80与90年代有着重要的影响。一般学者对“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的理解是，认为从事文艺理论研究的学者主要是把自己的用力投放在文学理论及现当代文学艺术的批评上，因为文艺理论研究的时代性很强。其实，我们从王老师多年积累的科研成果来看不难发现，他的学术生涯，恰恰是当代文艺理论家群体中的学养厚重者。

王老师在一生的学术思考中沉淀出一种宽阔的学术视域，从王老师丰沛的科研成果中，我大致为他曾涉及的领域划分了如下的研究方向：文学理论、西方文论、现当代文学批评、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美学原理、中国古代美学与马克思主义美学思想等；不仅如此，我在这里特别想说的是，王老师的诗歌与散文也写得极有情致，在风格与气象上自成一家。

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文艺学专业是由黄药眠先生创立的，这个学科点的前辈学者及后来的接续者分别参与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次美学大讨论，所以这个学科点的前辈学者与青年学者，或多或少都对美学及其相关理论充满了兴趣及关注。也正是出于这样一种学缘的内在维系，我与这个学科点其他学者一样，对美学及其相关理论的讨论也有所了解，并且充满了阅读的介入性，尽管我没有专门投入精力与时间撰写过美学方面的文章。

我在拜读王老师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时，王老师的思考与论述总是时时把我带回到两次美学大讨论的热点话题中，因为至少当年我作为青年学者切实地经历了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的第二次美学大讨论。

在我们这一代学者的记忆中，那是一个美学激情勃发的年代，也更因为那个年代关于美的本质及美感的讨论实质上是在隐喻中指涉国家意识形态的批评与构建，美学既是那个时代的显学，也成为那个时代无可规避的学术政治话语。

让我怎么也无法忘却的是，从70年代末的伤痕文学走向反思文学、寻根文学的80年代，接续关于美的本质及美感的讨论，更多美学家的思考也归返到中国古

代文化传统自身，以学术思考的姿态来叩问这个国家的命运，在文化寻根的终极探究中，企图为此民族走向未来的发展言说些什么，所以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也成为 80 年代的显学。

我记得 1982 年李泽厚先生的《美的历程》于文物出版社推出后，引发了新时期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讨论，这部十几万字的中国古代美学论著透切地把西方美学、哲学及相关艺术理论带入，以西方异质文化的理论视域来理解与解释中国古代的审美文化。不可否认，《美的历程》曾在研究的视域与方法论上，启迪了一代中国青年学者。

随后 1985 年叶朗教授在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了他的《中国美学史大纲》，进一步推动了把丰沛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构建在现代美学体系上的设想。在《美的历程》之后，李泽厚与刘纲纪先生联袂再度构建了一个更为宏大的中国美学体系，希望能够推出五卷本《中国美学史》。李泽厚与刘纲纪先生主编的《中国美学史》第一卷与第二卷分别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这两卷《中国美学史》曾带动了更多的青年学者追问中国美学的思考，严格地讲，是中国古代美学。我们都不曾忘却，中国美学研究，或者说，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已然成为那个时代学术追踪的主潮。

对于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者来说，从文学理论及现当代文学艺术批评的研究过渡到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这对于文艺学研究者的知识结构、语言能力、研究视域等均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与挑战。因为“aesthetics”——“美学”作为一门学科是从西方欧陆借道日本岛国再译入中国大陆的。“aesthetics”作为一门学科名称的自觉是由德国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亚历山大·哥特利布·鲍姆嘉通（Alexander Gottlieb Baumgarten, 1714—1762）提出的，有趣的是鲍姆嘉通是大陆理性主义哲人，“aesthetics”在古希腊语的语源那里有“感性”或“感性学”的意思，他却取用这样一个术语来讨论诗及其哲学沉思的问题，其实鲍姆嘉通的美学在本质上就是艺术哲学。当然，这是西方美学谱系上的一个重要的坐标性问题，不是我及我的学力在这里可以给出详细讨论的。据说又是东洋卢梭——中江兆民把“aesthetics”这个术语翻译为“美学”，“美学”再迂回曲折地从日本借道走向了中国的汉语学界。“美学”是一个漂亮的且容易给人误导的译入语概念。

众所周知，我们现下面对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是由汉字书写与记忆的，其中必然沉淀着由写意性汉字营构的丰沛的美学思想，其不同于西方拼音语言所承载的那种抽象性逻辑思维文化，中国古代审美文化的体验性与感悟性不同于西方那种理论化与体系化的逻辑思考。注意，我在这里很小心地使用“不同”（difference）这个表达，

而拒绝使用“缺少”这种类似具有贬损性的话语。中国古代文化的感悟性与西方文化的逻辑性在本质上没有高低之分，其各自构成了自身哲学、美学及文化艺术的差异性审美特质。

当然在西方学术文化史的谱系那里，美学是哲学的分支，因此操用西方美学、哲学及相关艺术理论来透视丰沛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同时，以丰沛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补充、丰富、修订或重写西方的美学、哲学及相关艺术理论，使两者在汉语语境下汇通与对话，在交集中整合一种更为具有普世性的国际性美学思想，这也是全球化时代美学研究的必然归宿。这也是汉语美学家的学术责任。

我在这里不讨论美学的相关问题，只是在拜读王老师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时谈一些自己的感想。显而易见，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在知识结构上其必然是国学与西学的汇通性整合，客观地评述，中国古代美学在20世纪80年代的崛起，在学术品质上切实地推动与提升了文艺学及其学科品质的发展。但尽管如此，以个人的身份撰写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学者毕竟还是少数，因为这是一项宏大的学术工程。谈及那个时代个人书写中国古代美学史的学者，我想不能不提及侯敏泽先生。

侯敏泽先生曾以个人的身份撰写了三卷本的《中国美学思想史》，这的确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其中第一卷是1987年于齐鲁出版社推出的。我曾向敏泽先生请教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相关问题，其中也涉及当时学界对李泽厚先生《美的历程》的批评。当时敏泽先生的表述曾让我非常震惊，因为那个时代的我在求学的历程中，一路是读着李泽厚先生的文章与专著走过来的，对李泽厚先生的学识及提出的观点充满了敬重。事隔若干年后，我逐渐地意识到，相关学者对《美的历程》的商榷，更多的是依据不同的理论背景及学养，对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理解与解释所产生的差异性。简单地举例，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与从事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其两者在学科的观念、视域、方法论、知识结构与所解决的问题等方面，的确存在着交集的差异性，双方相互看视时都会持有自己的立场，所以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学术观念与学术观点上的冲突。学者往往是聪明且自负的，所以也是敏感且自尊的，往往会据守各自的立场就一个细微的学术观点，相互商榷以至于抨击，还有可能肇事为一场波澜壮阔的学术文化冲突。其实，就我看来，说到底双方各有千秋。

我记得在攻读硕士时，王利器先生曾给我们开设目录学的课程，我出于对理论思辨的天然兴趣，额外地向王利器先生请教老庄哲学的问题，王利器先生一开口即给予我一个否定性的表达，把我的提问顶了回去：“中国古代没有哲学。”当然我们都知道，从胡适先生、冯友兰先生与张岱年先生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系统性

梳理，其背后均隐含着西方哲学理论构架的介入与支撑。其实关于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也是如此，无论怎样，西方美学理论的隐性或显性带入，或过度地带入，其必然导致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在结论上所形成的多元性与差异性立场。

在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中，西方美学、哲学及其相关理论的翻译、旅行与介入，推动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研究走向了众声喧哗的繁华，从某种程度上讲，对从事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研究的相关学者也给予了重要的方法论启示。当时我就注意到，从事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学者，他们往往来自三种不同的研究方向：哲学、文艺学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李泽厚先生与叶朗先生是早年毕业于北京大学哲学系的学者，敏泽先生与王向峰先生是从事文艺学研究的学者，关于从中国古代文学批评转向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学者则更多，我在这里就不一一提及了。其实，划分与确定来自这三种学术背景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者是非常重要的，正是依凭于这三种学术背景的学者，他们面对着共同的中国古代审美文化及其文学艺术传统，必然给出不同的中国古代美学思想的研究。说到底，谁也不可以以自己的研究结论以终结人类学术史的发展，谁也不可以仅凭自己的一篇文章或一部专著包打天下的学术思考，否则那就是一种无知的狂妄。

还有一件事情很难让我忘却。20世纪80年代中期，我在四川师范大学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所攻读文献学硕士时，屈守元先生曾给我们开设了一年的经学课。从其他同学那里，他得知我特别喜欢西方美学与中国古代美学等，在上课时，他不经意地说了一句：“美学热不了几年，那是理论！”屈守元先生是蜀学文献学大家向宗鲁先生的弟子，我对他的小学功底充满了敬重，然而对他的这句表述私下里有些不以为然，那个时候我还年轻，又因为对美学、哲学及相关文学文艺理论有着执着的偏爱，所以在心理上是无法接受他的告诫的。结果20世纪80年代之后，国家的发展战略转向大力推动经济的发展，而回避讨论政治与文化的问题，瞬间崛起的全民经济大潮把关于意识形态领域的理论讨论顷刻间席卷得烟消云散，炙手可热的美学随即也沉寂了下去。

回忆到这里，在逻辑上我依然是从拜读王老师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为聊聊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命运而做背景的铺垫。从20世纪的最后十年到21世纪现下的十四年，在这二十四年中，美学到哪里去了？较之于第一次与第二次美学大讨论在波澜壮阔的理论冲突中所波及国家意识形态的问题，美学的前沿性与厚重性问题哪里去了？较之于所卷入的那些显赫的学者：朱光潜先生、宗白华先生、黄药眠先生、蔡仪先生、李泽厚先生、洪毅然先生、高尔泰先生、蒋孔阳先生等，美学家们

又到哪里去了？的确，两次美学大讨论，中国学界的美学家迫于国家意识形态的张力性冲突，他们赋予“美”这个汉字太多的政治意义，“美”是当代中国政治无意识所沉淀的一个汉字书写。无论是“羊大为美”也好，还是“羊人为美”也好，“美”这个汉字书写太累了，“美”终于在过度意义的负载中被挤压得疲惫不堪。

特别有趣的是，在两次美学大讨论的时代，美学曾是一门烜赫一时的贵族学科，而晚近十多年来，美学界关于“日常生活审美化”的讨论，让美学在最后的坚持中，从曾经烜赫的贵族学科跌向了大众化与通俗化，接续又收拾于生态文化的介入中，远离了两次美学大讨论曾经拥有的哲学性、思辨性、精英性、深度性与学术性。

美学最终失落了它本然的繁华！

我在此简述中国当代美学发生与发展的逻辑，最终还是为了论及王向峰老师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在21世纪的当下撰写与修订一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无疑这是接续于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以来的逻辑坚持，对王老师关于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个人行为来说，这是一种坚持久远的学术信念。因为，王老师毕竟是从第二次美学大讨论中走过来的学者。

据我所知，王老师的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一开始就不是想在一个宏大体系上作为一部中国古代美学通论而书写的，即不是以一般专书的写作理念通写下来的。王老师是抓住一个朝代的重要美学范畴或一位重要的美学思想家，以一篇一篇专论文章的形式接续书写下来的，是写一篇专论文章而发表一篇。王老师是以这种集腋成裘的研究节奏，在一篇篇专题研究论文的书写中，最终缓步成就了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用王老师自己的话说：“回忆本书的成书过程，我用去了三十多年的时间。”这无疑构成了王老师这部专著的特色之一。

我个人认为，那种以一般专书的写作理念，快速通写下来的中国古代美学史、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史、中国古代思想史等，其中可能水分特别大，每一章节都不可能抽取出来，独立地结构为一篇厚重且有思考深度的大块文章给予刊发。那种以一般专书的写作理念快速通写下来的学术史，在短时间内即可以形成一部几十万字的书稿，而实际上，其结果也只可能从其中浓缩出一两篇较有质量的文章，其他的剩余也多是水分了。理解了这一点，我们也就理解了王老师的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为什么接续撰写与修订了这么多年，并在这样一个美学失落繁华的年代不夸张地推出。这，是一位求真学者的品质所在。

王老师撰写的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是抓住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史上重要的美学范畴与重要的美学思想家，提纲挈领地结构与撰写下来的，其实，这种做法

是一种谦卑。这部专著的提纲性、简约性与通贯性是其特色之二。提及这部专著在书写观念上呈现出的通贯性，我们不难发现，王老师在论述一位美学家时，是把这位美学家的思想通贯在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谱系上给予展开性论述的。如王老师在论述《沧浪诗话》的美学思想时，是前起钟嵘《诗品》的影响开始论说严羽，后而再向下追寻到王夫之、叶燮与王士禛等对严羽的承继，这种论述观念上的历时性逻辑承接，特别易于使读者能够把握中国古代美学思想发展的逻辑脉络。所以这部专著特别适合于本科生与研究生作为进入中国古代美学殿堂的基础必读书。

我为什么在上述回忆了那个时代中国古代美学研究作为一脉主潮崛起的学术文化背景，王老师的《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持续性撰写与修订了三十多年，这部书稿的思考与写作曾经历了第二次美学大讨论在政治无意识中所掀动的理论繁华，又经历了诸种“后主义”理论所造势的“日常生活审美化”的众声喧哗，其实无论是真正的繁华还是虚假的喧哗，我们在此刻阅读王老师的这部书稿，必然会不期而遇地收获这样一种感受，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在品质与气象上秉持有一种美学在繁华落尽之后的朴素，这是王老师这部书稿的学术特色之三。

在第二次美学大讨论的繁华时段及其开始走向寂落后的若干年，从事中国古代美学研究的学者，大都热衷于把那个时代的汉译西方美学、哲学及相关文学艺术理论带入自己的思考与研究中，以透视与构架中国古代文献中沉淀的美学思想，从学理上讲，这是必然的，也是必须的，只是有适度诠释与过度诠释的不同而已。然而结果却导致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在价值取向上，向那个时代汉语学界所接受的西方理论生成，当物换星移之后，那个时代的中国古代美学研究因其所依凭的背景理论失去了轰动效应，自身也退向了学术的边缘。

由于王老师在撰写这部《中国古代美学史论》时，他对汉译西方美学、哲学及其相关文学艺术理论的带入，是潜在的，是一种隐性的汇通，因此，在整部书稿修辞的字面上存留了中国古代美学思想文献的本真与朴素。

在中国古代美学的研究中，当理论的繁华过度压倒了文献思想的朴素时，王老师所持有的这一学术观念则是一种淡然的大智慧了。也因此，王老师的这部书稿获得了长久的学术生命力，其适应于任何一个时代的学者以依凭现下的理论视域去丰富与诠释那些朴素且归类的中国古代美学文献。

我记得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我曾两次去沈阳辽宁大学王老师家里接受他的指导，两次都是在冬季。北方的冬季是非常寒冷的，当时做博士论文的压力也非常大，而我在王老师家中的小住，让我感受到了王老师及师母给我带来的温暖，在读书的

那个特殊时段，这种温暖的浸灌是那样的珍重，让我在情感的记忆上一直延续到现在，从未曾忘却过。1996年初夏，王老师从沈阳来北京开会，顺道来承泽园我家里看看，他了解了我及我们这代青年学者在北京求学的艰辛时，也是非常感慨的，同时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王老师的话我现在还记得。因为家庭与历史的原因，我这一生行走得非常坎坷，很少有机会能够得到别人的帮助，也正是如此，别人可能给予我的一点点恩惠都会让我感激不尽，更不要说王老师对我的大爱了。

2014年8月17日

于复旦大学光华楼西主楼